

现代奥运会场馆治理的历史进程、多重困境与消解之道

王海燕, 王润斌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奥运场馆的超大规模与巨额成本使奥运会的举办频遭诟病。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 对百年奥运场馆数量波动上涨、使用更新优化、布局模式转换、配套迭代升级的状况及成因进行解析, 认为场馆规划有失致使额外成本攀升, 场馆利用不佳导致场馆荒废闲置频现, 办奥挤出效应招致反对浪潮频发, 场馆治理不当引致生态破坏屡现, 据此提出若干消解策略: 超前规划场馆, 规避奥运场馆赛后“白象化”; 注重赛后利用, 促进奥运场馆发展可持续; 倡导节俭办赛, 探索场馆多元利用新举措; 注重低碳环保, 追求场馆治理环境正影响。

关键词: 体育管理; 奥运场馆; 白象化; 成本超支

中图分类号: G81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4)01-0064-07

The historical process, multiple dilemma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government for modern Olympics venues

WANG Haiyan, WANG Runb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The super-huge scale and enormous costs of the Olympic venues have made the Olympic Games frequently criticized at present.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the fluctuating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lympic venues, the updating and optimization of 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yout mode, and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believes that the improper planning of venues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extra costs, the poor utilization of venues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abandonment of venues, and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of Olympic venues leading to frequent opposition waves, and improper management of venues also leading to frequent ecological damage. Some resolution strategies are then put forward: planning venues ahead of time, avoiding the "white elephant" of Olympic venues after competition; focusing on utilization after competi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lympic venues; advocating frugal running of venues, exploring new measures for multiple utilization of venues, and focusing on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rsuing posi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venue governance.

Keywords: sports management; Olympic venues; white elephant; cost overruns

奥运会的发展与演进以特定的场馆设施为依托。现代奥运会发轫之初, 奥运会的举办主要依赖已有的场地和设施, 但随着奥运会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与奥运会相关的场馆及配套设施也日益增多并逐步完善。二战之后, 随着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兴起与普及, 奥运会为各个国家、地区、城市提供以低成本曝光与展示自己的平台, 同时也为主办城市提供吸引资金以

实现城市更新与再生的平台, 诸多城市以办奥为契机, 实现去工业化改革, 办奥为城市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增益, 在全球掀起一股申办热潮。

奥运场馆设施建设在为主办城市带来诸多增益的同时也产生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新建场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招致环保组织及区域民众的反对, 而蒙特利尔大陷阱的出现更让申办城市对办奥的经济效益产生担

收稿日期: 2023-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研究”(14CTY013)。

作者简介: 王海燕(1993-),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E-mail: 1406105892@qq.com 通信作者: 王润斌

忧。1978年洛杉矶作为唯一的申办城市承办1984年第23届奥运会,通过商业化运营使该届奥运会扭亏为盈,奥运申办再次回暖。然而,奥运场馆的“白象化”趋势却并未因此得到改善,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举办令希腊债台高筑,奥运场馆也因缺乏赛后维护而沦为废墟,奥运场馆的高成本与低效用问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奥运场馆建设缘何使奥运会举办深陷成本超支难?百年奥运场馆的演进历程又有何规律及动因?奥运场馆建设为何频遭诟病?国际奥委会及主办城市等场馆治理主体又当如何改革突围?可见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与阐释有利于解析奥运场馆的发展脉络及发展困境,探析场馆治理困囿的消解之道,助力奥运场馆的良性发展。

1 成本超支现象:奥运会场馆的“白象化”

现代奥运会自发轫以来,其赛事规模、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随之而来,奥运会成本超支问题也日益凸显。2016年牛津赛德商学院一份关于奥运会成本和成本超支情况的研究报告指出:所有的奥运会都出现成本超支的情况,47%的奥运会成本超支率超过100%,其中,夏季奥运会超支最大的为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720%,冬季奥运超支最大的为1980年普莱西德湖的324%^[1]。介于奥组委成本大致可实现收支相抵,甚至有所盈余^[2],办奥的成本超支便聚焦到非奥组委直接成本上,即为办奥而修建的各类场馆等。

牛津赛德商学院关于奥运会成本超支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Holger^[3]对牛津赛德商学院的研究提出异议:牛津商学院的研究数据来源较少,对于某些届次的奥运会,其数据完全来自于申办书和官方报告,出现虚假极端结果;而且,部分数据来源并未区分直接和间接的非奥组委成本,对奥运会两本经济账产生混用,呈现出不存在的高波动。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举办奥运会的费用分为3类,即“奥组委成本”“非奥组委直接成本”以及“非奥组委间接成本”,其中“奥组委成本”主要为办奥产生的运营成本,如技术、运输、劳动力和行政管理费用等;“非奥组委直接成本”主要为主办城市、国家、私人投资者为建造各类与办赛直接相关的场馆设施等而产生的成本,如为建设比赛场地、奥运村、国际广播中心、媒体和新闻中心等所产生的费用;“非奥组委间接成本”则是为筹备奥运会而产生但与举办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的商业投资,如为办奥修建的公路、铁路、机场基础设施、酒店升级等。因“非奥组委间接成本”并非为办奥所需,故国际奥委会官方在统计成本数据时,并未将该部分成本纳入其中。因此,办奥成本主要由“奥组委

成本”与“非奥组委直接成本”组成。由于每届奥运会都位于不同的城市,各主办城市等场馆治理主体均拥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政治制度等,为奥运会多花或少花钱的理由,取决于奥运会的每个项目为其创造的利益。因此,并不存在成本“不确定的”这种假设。同时,为对该研究做出回应,Holger等^[4]对2000—2018年(在此时段,奥运会的规模和组织已相对稳定)间的奥运会成本和收入超支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000—2018年奥组委的运营成本通常由收入支付,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私人资源和国际奥委会,如媒体版权与国际赞助等,各届奥运会大都可实现收支相抵,甚至有所盈余,而非奥组委投资,确实出现成本超支的现象,成为奥运会超支的主要因素。

当前,大型项目存在绩效悖论,在全球范围内提议与实施更多和更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同时,却有越来越清晰事实,那就是许多这类项目在经济、环境和公众支持方面的绩效都差得出奇,成本超支和收益低于预期,这经常将项目的可行性置于风险之中,当初被视为经济增长有效载体的项目反倒被视为这种增长的障碍^[5]。温哥华在申办冬奥会期间,将办奥总成本估算为10亿美元,但在奥运会前夕,办奥成本已飙升至60亿美元,奥运会余波散去后,成本达到80~100亿美元。介于奥运会公私合作制的筹办模式,加拿大各级政府被套牢,只能将办奥成本与财政责任转嫁至纳税人身上^[6]。2000年悉尼奥运会由于场馆规划建设不合理、耗能过多,致使大量场馆被赛后弃置^[6]。19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治理等理念开始普及,社会民众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声以争取其合法权益,奥运会的成本超支现象占用大量公共财政资源,挤压其他本当以其他形式惠民的财政措施,并伴有将巨额亏损转嫁于纳税人的风险,招致举办地民众的抵制与反对;而且,奥运场馆建设所耗费的巨额资金与场馆华而不实难以进行有效利用的既有现状,使奥运场馆的治理陷入困境,场馆兴建频遭诟病,涌现出“要面包不要马戏团”、抵制2014索契冬奥会等抗议团体^[7],将办奥的成本超支问题推至风口浪尖。

2 现代奥运会场馆治理的历史进程

奥运会作为当今社会的盛典,致力于通过体育帮助人类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然而,在奥运会结束后奥运场馆会发生什么?有多少场馆能被有效利用?各类场馆治理主体又当如何提高场馆遗产的使用效率?因此,对既有场馆治理经验的总结与学习有助于后续办奥城市汲取经验、规避教训,使主办方从中获益以推进场馆遗产效益最大化。在此背景下,国际奥委会于

2022 年发布《Over 125 years of Olympic venues: post-Games use》(超过 125 年的奥运场馆: 奥运会后的使用情况), 对 1896 年雅典奥运会到 2018 年平昌奥运会的 51 届奥运会场馆状况进行统计, 展现奥运场馆发展的动态历程^[8]。

2.1 赛事规模助推场馆数量波动上涨

总体而言, 无论是夏季奥运会, 亦或是冬季奥运会, 其场馆数量均呈现出波动上涨趋势, 而影响奥运场馆数量的因素较为繁多。首先, 奥运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是导致其场馆数量波动上涨的因素之一。现代奥运会发轫之初, 其赛事影响力较小, 诸多运动项目只能在天然场地中比赛, 如 1900 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便是在塞纳河中举行的。随着奥运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增, 尤其随着广播、电视等的普及, 各主办城市希望以办奥为契机, 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各类场地设施的建设标准及总体数量稳步上涨。其次, 随着奥运会不断发展, 赛事项目的扩增也对奥运场馆数量提出新的要求。第 1 届现代奥运会共设置了 9 个大项 43 个小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呈现递增趋势, 2020 东京奥运会达到 33 个大项和 339 个小项。诸多项目的开展必然以特定场馆为依托, 这也导致奥运场馆数量的攀升。再次, 运动员群体规模的增长、媒体等其他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加也促使办奥城市增设奥运村等基础设施, 以便为运动员提供更舒适的参赛场所。另外, 主办城市的办奥意图、财力储备等均影响奥运场馆数量的变迁。

2.2 时代演进助力场馆使用更新优化

不同年代奥运场馆的现有使用状况并不相同。目前, 有 85% 的永久场馆尚在使用中, 其中 20 世纪早期、20 世纪中期、20 世纪晚期及 21 世纪尚在使用的永久场馆比例分别为 70%、82%、90% 及 92%, 呈现递增趋势。现有场馆存在多种用途, 如作为体育设施、旅游景点, 以及商业、文化或教育设施等被继续使用; 在未被使用的场馆(124 个场馆)中, 部分场馆因年久失修已被拆除, 部分场馆在战争或事故中被损毁, 部分场馆被新的城市发展项目所取代等^[9]。永久场馆所占比例的递增趋势, 除各类天灾人祸的因素外,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类场馆前期规划、赛后利用等治理过程渐趋合理。在临时场馆的使用情况方面, 20 世纪早期、20 世纪中期、20 世纪晚期及 21 世纪临时场馆占场馆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17%、9%、7% 及 14%, 呈现出先回落后上涨的趋势。现代奥运会源起之初, 比赛场地的配置更为简单, 而且国际奥委会、主办城市等场馆治理主体的办奥资金并不充裕, 因此, 各办奥城市修建各类临时场馆以供办赛之需^[8]。随着奥运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临时场馆所占比例开始下降。20 世纪

中后期至 21 世纪, 奥运场馆的“白象化”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国际奥委会也在积极制定各类政策以倡导节俭办奥、绿色办奥, 临时结构以低成本、易拆除, 且能满足比赛技术要求的优势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因此, 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 临时场馆在总场馆中所占比例出现回升趋势。

2.3 权力博弈反推场馆布局模式转换

随着奥运会的不断演进与发展, 奥运场馆的数量渐次增多, 奥运场馆的布局模式也在不断演进与发展, 奥运场馆总体呈现出由单场馆为中心办赛期, 向单中心集中布局与分散布局办赛期, 再向单中心、多中心及整体分散布局交替办赛期演进^[9]。现代奥运会在发轫之初, 奥运会的举办大都依靠既有场馆及各类天然场地, 各办赛场馆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这也造成奥运场馆在空间分布上的混乱与无序。1896 年雅典奥运会便是其中的代表。随着奥运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各办奥城市对奥运场馆的投资与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大, 奥运场馆的数量不断增多, 而且, 为对运动员的参赛产生便利, 奥运场馆的布局模式也在发生转变, 出现单中心集中布局与分散布局办赛期。如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中,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柏林奥林匹克游泳馆、曲棍球体育场等场馆设施被集中安置^[9]。伴随着奥运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诸多办奥城市开始对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予以重视, 奥运场馆布局除为运动员提供参赛便利外, 亦开始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出现单中心、多中心及整体分散布局交替办赛期。北京 2008 年奥运会便是其中的代表。

奥运场馆布局模式的转换升级, 体现出办赛需求与城市需求制约与联动, 亦是奥运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权力博弈。起初, 由于资金的短缺, 奥运场馆的建设与选址只能由主办城市因地制宜。随着奥运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赛事的举办、奥运场馆的选址与规划需要经过国际奥委会的认同与认可, 以便为运动员提供便捷的参赛环境, 这便对场馆布局与城市交通提出要求。而城市发展则希冀于场馆布局能优化城市的配套设施, 追求场馆使用效益最大化。上述种种需求推动着奥运场馆空间布局不断演进完善, 以迎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2.4 效益驱动促使场馆配套迭代升级

现今, 各城市为办奥而投入大量资金以改善基础设施, 这笔资金甚至一度超过办奥期间的场馆建设资金。1896 年第 1 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 彼时由于资金限制, 办奥并未有相应的配套设施, 部分奥运场馆也都是通过私人资金在既有场馆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在 1908 年伦敦奥运会上, 主办方第 1 次专门为办

奥修建大量新场馆和设施。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奥运村的形式为运动员提供第 1 个公共设施。在此之后,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更是在 130 公顷的场地上开发一个体育和文化区, 包含培训设施、体育中心等。1960 年罗马奥运会以办奥为契机, 对办奥城市进行改造, 如改善供水系统、交通设施等, 办奥配套设施开始迭代升级。在此之后, 诸多办奥城市开始以办奥为契机, 推动城市、区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 以追求办奥效益最大化。东京举办 1964 年奥运会之际, 组织者和政府以办奥为契机, 助推城市的 10 年发展计划, 包括娱乐和体育场地建设、道路改善、海港开发以及住房和旅游住宿项目等, 对东京的城市结构产生重大影响^[10]。1988 年汉城奥运会花费近 140 亿美元用以改善交通和美化城市^[11], 办奥开始成为城市转型更新的催化剂。作为一种国际性赛会, 奥运会很难短时间内在同一城市举办, 对办奥相关设施的投资, 类似于一种“一次性”投资。随着奥运会国际影响力和办赛规模的不断扩大, 这一投资的金额也在不断上涨, 主办城市必须审慎对待, 以确保投资能对城市或地区发展产生长期效益。因此, 在奥运会的发展进程中, 主办城市也开始尝试以办奥为契机, 推动城市发展的长期规划, 推进共赢发展。

3 现代奥运会场馆治理的多重困境

3.1 赛前规划有失致使额外成本攀升

伴随着奥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及办奥所需场馆数量的不断攀升, 主办城市的既有场馆在数量、规格等方面越来越难以应对办赛需求, 亟需规划与建造新的场馆以应对办赛之需。但是, 诸多办奥城市对奥运场馆的规划不甚合理, 加之场馆在建设过程中易造成成本超支且成因难以预测^[12], 使场馆建设的额外成本攀升, 面临“白象化”困境。

主办城市在进行场馆规划时, 由于申办时过度承诺以及不可预测的通货膨胀、场馆建造的人力、物力成本上涨等问题, 致使场馆建设屡遭掣肘, 额外成本迅速攀升。蒙特利尔在办奥期间, 时任市长意欲通过办奥来更新、重建城市, 却在奥运会筹办期间遭遇全球经济动荡, 部分场地设施因新建筑材料的使用而面临严峻的技术和施工问题, 筹办期间的劳资关系纠纷耗费 155 个工作日, 为按期完工主办方不得不采取 24 小时工作制, 造成加班费、供暖费、设备租金、分包商延误等一系列额外成本, 最终使蒙特利尔承受近 15 亿加元的债务^[13]。除此之外, 缺乏对场馆建设地点的调研与了解, 亦是造成场馆规划失误的重要因素, 造成社会投资的严重浪费。比如 1956 年墨尔本办奥期

间, 奥运场馆的选址未经过科学的规划, 导致奥运会赛车场无法被当地社区有效利用^[14]。

3.2 赛后利用不佳导致场馆荒废闲置频现

奥运场馆的赛后运营需庞大的资源投入与良好的场馆治理方以维系。20 世纪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期, 诸多奥运场馆出现赛后运营不佳的现象, 雅典在举办 2004 年第 28 届奥运会之后, 受经济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政府无力负担高额的场馆运营支出, 大量场馆遭到弃置。奥运场馆巨额的赛前成本投入与惨淡的赛后运营形成鲜明对比, 奥运场馆的“白象化”使场馆治理主体蒙受巨额损失。

奥运场馆的赛后治理面临诸多变数, 受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钳制, 场馆的赛后利用不佳极易导致“白象化”的产生。首先, 就场馆内部的自身运营而言, 奥运场馆因其庞大的规模与体量, 需要与之匹配观众流以维系场馆的赛后运营, 这对场馆的运营模式、运作效率等提出极高要求, 若场馆无法吸引各类赛事与活动, 租户、地方政府等场馆治理主体将花费巨额资金以维系场馆正常运营。而且,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技术的革新, 老旧的场馆需要大量资金以进行场馆的更新与升级, 涉及更为庞大的成本支出^[15]。其次, 就场馆外部的可变环境而言,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风暴及各类公共卫生事件等的爆发, 严重制约着奥运场馆的赛后经营, 甚至危及赛事的举办。东京 2020 奥运会便因新冠疫情之故推迟举办, 场馆的延期交付造成场馆的闲置浪费以及维护管理成本攀升。而且, 东京 2020 奥运会结束后疫情仍未结束, 场馆赛后运营更是雪上加霜。上述种种均为主办方添上一笔沉重债务。

3.3 办奥挤出效应招致反对浪潮频发

Boykoff^[16]指出, 奥运会这一经济模式可被称为“节庆资本主义”, 即媒体所产生的的节庆氛围形成一种“例外状态”。“节庆资本主义”将国家行为者作为合作伙伴来操纵, 以公私合作为经济基础, 但这些公私合作关系往往是一边倒的: 公众付钱, 企业和私人受益, 即由公众承担风险, 而企业和私人团体则获得回报。在公私合营伙伴关系的支配下, 政府可能与基层选民的政策偏好脱节, 允许在为弱者服务的幌子下为合作伙伴的利益服务。在此种状态下, 奥运会显然具有显著挤出效应。

奥运会的挤出效应在办奥全周期均有体现。在奥运会筹办期, 政府为建设赛事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能被视为流入经济的新资金, 而是对现有公共资金的重新分配, 其面向奥运场馆的资金倾斜, 必然会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挤压^[17]。同理, 对办奥所需各类场馆、道路等的投资, 都可能忽视其他社区需求^[18]。而且,

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举办地周边地区的酒店及餐饮的销售额会明显低于正常水平^[16]。而赛后,奥运村等场地设施最终将该地区从一个工人阶级地区转变为一个主要由中上层居民居住的社区^[13],温哥华在办奥期间,政府背弃将福溪入海口一大片奥运村改建为社会住房的承诺,并将原有 20%住房面向低收入人群等办奥承诺推翻^[5]。而且,政府对奥运场馆投资所产生的新就业岗位,大都是“低工资、低技能、临时和兼职的就业”^[17],难以产生长久的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资金用于其他用途,可能还会创造就业机会。

3.4 场馆治理不当引致生态破坏屡现

奥运场馆尤其是冬奥会各类场馆的规划与选址,对地理位置等条件有较高的生态要求,各类场馆在建设期间,以及运营使用期间,必然会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19 世纪 60—70 年代,政治生态学概念兴起,国际社会对于加强生态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奥运场馆的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引致环境保护组织及当地居民的反对。生态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对奥运会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生态保护与奥运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户外体育活动的开展、游客的旅行和消费都有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18]。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期间,为建造跳台和下坡滑雪道,主办方砍伐 100 公顷森林;为对雪橇赛道进行冷却,主办方投放 45 吨氨水等,该届冬奥会也因此被称为“对自然环境破坏性最大的运动会”,招致公众及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19]。虽然候选城市在申办奥运会时做出相应的环保承诺,但能贯彻落实到位的却寥寥无几。2014 年索契冬奥会曾承诺举办一届废弃物零排放奥运会,但也因建筑垃圾的倾倒、土地征用激进、自然景观破坏、有毒废水排放等环保问题招致诟病^[20]。因环境资产的相对隐性特征,其在办奥过程中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这也是奥运场馆建设频遭抵制的原因之一。

4 现代奥运会场馆治理困境的消解策略

4.1 超前规划场馆,规避奥运场馆赛后“白象化”

奥运场馆的规划与选址,不仅关乎到场馆的赛后利用,亦对城市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奥运场馆进行合理的落址与规划,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场馆“白象化”的出现,使场馆更好地嵌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添加新引擎。北京在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期间,便对各类场馆进行超前规划,如冬季两项中心和北欧中心将在赛后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基地、体育比赛场地和体育爱好者的滑雪胜地等继续使用等^[21]。当下,我国正在积极筹办、申办各类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如正在

筹办的亚冬会以及意欲申办的冬青奥运会等。因而,对国际社会的场馆规划导向进行梳理与总结,有利于为各类大型体育赛事提供规划目标与规划经验,助力场馆的合理规划。

从国际层面而言,国际奥委会颁布的《议程》中,自申办阶段便开始对场馆的后续利用予以重视^[22]。如建议二的第 2 条指出,场馆的规划与选址必须考虑到赛后的运营状况,以对所在地区产生长期的效益;第 4 条则对现有场馆的最大化利用、对临时场馆的倡导性使用以及对新增场馆的谨慎性投资提出要求。《2020+5 议程》则对赛前奥运场馆等奥运遗产的资金落实情况予以重视,以确保遗产计划、治理结构和长期资金在办赛周期的早期就到位^[23]。上述文本显示出国际层面场馆规划动向与趋势,结合现有场馆规划的弊端而言,未来奥运场馆及其他各类场馆的规划应注意:首先,应当对场馆的选址予以重视,以使场馆对周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化,并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其次,应当做好场馆建设资金的预算与落实,防止场馆建设资金的无度消耗或短缺;最后,应当对场馆的赛后用途进行预先规划,以防止场馆赛后闲置,并力求为场馆所在地带来就业岗位、体育参与等诸多增益。

4.2 注重赛后利用,促进奥运场馆遗产可传承

对赛后场馆遗产进行科学、有效传承与利用,能有效规避场馆“白象化”现象的发生,维系后奥运时期奥运场馆的生命力,这便需要对后奥运时期奥运场馆的运营机制、管理制度、市场营销、资源投入等予以重视,以避免场馆的赛后闲置及弃用,促进奥运场馆遗产可传承。当前,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已进入赛后阶段,对各类场馆遗产进行良好的治理与利用,能有效规避场馆“白象化”现象。

为倡导奥运场馆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组二以可持续和遗产为命题,提出通过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城市联盟(UMVO)等外部组织的支持,确保在奥运会后对奥运遗产进行监控等内容^[22];《2020+5 议程》亦指出,将在奥运会后继续与遗产决策者进行互动,以巩固遗产成果,促进奥运遗产为举办地社区带来更多效益^[23]。综合当下各类赛后场馆利用困境而言,未来奥运场馆的赛后治理应在下述领域有所注重:首先,保障赛后场馆运营的资金供给,并力图通过良好的赛后治理,实现场馆的收支相抵乃至有所营收;其次,对赛后场馆运营状况进行有效的跟踪与监控,以确保各类奥运遗产得到有效落实;再次,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类方法手段,推进赛后场馆的有效利用;最后,防范各类外界不可控力对场馆赛后运营与治理的冲击,提前制备应急预案,以防范与

规避风险。

4.3 倡导节俭办赛, 探索场馆多元利用新举措

现代奥运会演变发展至今, 其超大规模与极高的成本超支率一直为学界所诟病。虽然我国在筹办 2022 年冬奥会期间积极履行节俭办奥的举措, 在现有场馆的改造与利用、以及临时设施的使用等方面均取得不俗成效^[24], 但部分国内大型赛事的举办还是消耗巨额资金, 如九运会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造价达 13 亿, 而十运会中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造价达 23 亿, 设施总开支更是达到 12 亿美元^[25]。在上述前提下, 节俭办奥、以及节俭办赛已是大势所趋。

为倡导节俭办奥, 国际奥委会进行积极的改革。

《议程》指出, 国际奥委会在申办阶段即开始考虑以下积极因素: 现有设施最大化利用, 临时和可拆卸场馆的使用, 无需增加固定场馆或者增加固定场馆有正当理由; 并且, 出于地理环境和实现可持续性的考虑, 还将允许奥运会全部的大项或小项比赛在主办城市之外举办, 在特殊情况下还可在主办国之外举办^[22]。综合而言, 若想实现各类大型体育赛事的良性发展, 节俭办赛已是大势所趋, 在未来办赛过程中, 可从以下层面着手, 节约办赛资金。首先, 倡导对已有场馆的改造与使用, 以节约场馆建设费用, 降低新建场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其次, 倡导临时场馆及可拆卸场馆的使用, 现今, 诸多临时场馆的材料能实现再次回收利用, 降低办赛成本, 减弱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同时, 亦未破坏城市总体的空间布局; 最后, 深入对区域联合办赛的探索, 以有效整合不同区域的场馆优势, 实现场馆资源的有效利用, 创造区域联动发展、共赢发展的新局面。

4.4 注重低碳环保, 追求场馆治理环境正影响

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的破坏及由此而引发的衍生效应对人类的自身发展及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随着各国民众主人翁意识的兴起, 各类环保组织渐次成立。奥运场馆, 尤其是冬奥会场馆对生态破坏的事实, 使场馆建设遭到环保机构及社区居民的反对, 为保障奥运会的良性发展, 国际奥委会采取各种措施以应对日渐高涨的环保呼声, 如将环境作为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三大支柱”^[26], 将对环境的评估纳入奥运会评估当中^[27]等, 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良性发展。

为实现奥运场馆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 国际奥委会在竞标开始阶段便体现出对环境的重视, 各候选城市在申办阶段应提交符合环境等领域长期规划需求的奥运计划, 并将与此相关的原则条例写入了《2022 版主办城市合同》中^[22]。同时, 《2020+5 议程》亦对奥林匹克运动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做出倡议, 如最迟在

2030 年之前实现气候友好型奥运会; 针对气候变化对未来奥运会的影响, 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要求在法定自然保护区和文化保护区不搭建永久性奥林匹克建筑等, 均为奥林匹克运动的良性发展与环境正影响提供制度保障^[23]。除此以外, 北京在筹办 2022 年冬奥会期间, 积极践行“绿色办奥”的理念, 在场馆所在地的生态保护, 以及场馆的低碳运营等方面做出较好表率^[24]。总体而言, 可从以下层面入手, 追求场馆建设治理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首先, 应当在办赛全过程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从申办规划, 到筹办规约, 再到赛后治理, 以实现场馆与周边环境和谐并存; 其次, 因地制宜、因地而异, 采取多元举措防治生态破坏, 如北京在办奥过程中便针对不同地域采取不同措施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最后, 将科技发展与环境治理相融合, 以科技为支撑助力场馆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奥运场馆的百年发展历程暗含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以及奥运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同时也给场馆治理主体带来诸多困扰。《议程》及《2020+5 议程》等文本的出台, 为奥运场馆的良性发展提供方向与指引, 亦为我国后奥运时期的场馆治理及其他各类大型体育赛事的规划与治理提供经验。贯彻国际奥委会的改革方针, 将奥运场馆嵌入城市发展, 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与办奥城市的共赢发展, 推动奥运场馆的可持续发展, 方能抑制奥运场馆的“白象化”趋势。

参考文献:

- [1] FLYVBJERG B, STEWART A, BUDZIER A. The Oxford Olympics Study 2016: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Games [R]. Oxford: Saïd Business School, 2016.
- [2] PREUSS H, ANDREFF W, WEITZMANN M. Cost and Revenue Overruns of the Olympic Games 2000–2018[M]. Wiesbaden: Springer Nature, 2019.
- [3] PREUSS H. Re-analysis, measurement and misperceptions of cost overruns at Olympic Gam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2022: 1-20.
- [4] FLYVBJERG B, BRUZELIUS N, ROTHENGATTER W. 巨型项目: 雄心与风险[M]. 李永奎, 崇丹, 胡毅, 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3.
- [5] BOYKOFF J. Power Gam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Olympics[M]. London: Verso, 2016.
- [6] 娄琼. 重视奥运场馆赛后综合利用[J]. 特区经济, 2008(6): 292-293.
- [7] LENSKEY J H. Olympic Industry Resistance: Challenging Olympic power and propaganda[M]. New York: State

-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 [8] Olympic Studies Centre. Over 125 years of Olympic venues: Post-Games use [R/OL]. (2022-04-22)[2023-02-18].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2287929/over-125-years-of-olympic-venues-post-games-use-the-olympic-studies-centre>
- [9] 陈晓恬,任磊. 百年奥运场馆构成与总体布局的演变[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1): 71-77.
- [10] CHALKLEY B, ESSEX S.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hosting international events: A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J].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99, 14(4): 369-394.
- [11] KELLY I. Th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associated with a hallmark event[G]//The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of hallmark events. Aldershot: Avebury, 1989: 263-273.
- [12] ESSEX S, CHALKLEY B. Olympic Games: Catalyst of urban change[J]. Leisure Studies, 1998, 17(3): 187-206.
- [13] HILLER H H. Post-event outcomes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The Olympics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s[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2006, 6(4): 317-332.
- [14] BOYKOFF J. Celebr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Olympic Gam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15] BAADE R A, MATHESON V A. The quest for the cup: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world cup[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4): 343-354.
- [16] BARCLAY J. Predict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ega-sporting events: Misjudgement of Olympic proportions?[J]. Economic Affairs, 2009, 29(2): 62-66.
- [17] LI S. Large sporting ev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vent infrastructure and venues[J]. Event Management, 2013, 17(4): 425-438.
- [18] CANTELON H, LETTERS M. The making of the IOC environmental policy as the third dimension of the Olympic Movement[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00, 35(3): 294-308.
- [19] Del F A G, ORR M.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environmentalism within the Olympic Mov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ent and Festival Management, 2019, 10(1): 67-80.
- [20] GEERAERT A, GAUTHIER R. Out-of-control Olympics: Why the IOC is unable to ensure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Olympic Gam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2018, 20(1): 16-30.
- [21] Comité de candidature de Beijing aux Jeux Olympiques d'hiver de 2022. Beijing 2022: Candidate City[EB/OL]. (2014-12-10)[2023-03-18].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30454/beijing-2022-candidate-city-comite-de-candidature-de-beijing-aux-jeux-olympiques-d-hiver-de-2022>
- [22] IOC. Olympic Agenda 2020: 20+20 Recommendations [EB/OL]. (2014-12-07)[2023-02-18].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20238/olympic-agenda-2020-20-20-recommendations-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
- [23] IOC. Olympic Agenda 2020+5: 15 recommendations [EB/OL]. (2014-12-07)[2023-02-18].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472511/olympic-agenda-2020-5-15-recommendations-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
- [24]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报告(赛后)[R]. 北京: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 2023.
- [25] 马国馨. 节约型社会与大型体育赛事[J]. 城市建筑, 2006(3): 6-11.
- [26] CHAPPELET J L. Olymp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s a legacy of the winter gam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08, 25(14): 1884-1902.
- [27] IOC. Technical Manual on Olympic Games Impact [EB/OL]. (2007-07)[2022-05-16]. <http://www.gamesmonitor.org.uk/archive/node/2313.html>